

复旦“方舱医院”已经过去 63 年了，漫长的岁月中，这段岁月并未磨灭，总在不经意间被人忆起，被人记录。

患病学生众多，学校专门将大礼堂登辉堂（现名相辉堂）设为隔离病房。复旦大学档案馆保存了时任保健科护士王芝芳提供的两张照片，其一为参与隔离病房的 8 位医护人员合影，其二是她和唐怀芬护士正在登辉堂内巡查患病学生，靠窗摆放的病床卷着白色的纱帐。

1957 年的流感更为猛烈，后来被称作“亚洲流感”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最严重的流感疫情。据研究，这场 A2 甲型病毒流感的病毒由 A1 亚甲型病毒经中间型变异而来，1957 年 2 月在贵州省首先暴发，3 月传播至其他省份，短时间内导致超过 25 万人患病，在全球范围内则造成 100 万—400 万人死亡。1957 年 3 月 27 日《文汇报》报道：“流行性感冒最近正在上海蔓延。据十天来不完全统计，30 所大、中、小学校，有 1678 人发病。”上海高校纷纷“中招”，同济大学、华东师大各有 200

多人患病。《复旦》校刊则称，“截至本月 30 日止，本校（复旦大学）已有 60 多个同学因患流行性感冒被送进隔离病室，因喉咙痒、轻微发烧等病状而到保健科就诊的人数，也超过了 150 个。”

邢醒医生也保存着一张小小的三寸照片，9 位白衣战士在登辉堂前大草坪上微笑合影。照片背后，标注着“五七年防治流行性感冒”。邢醒 1953 年进入复旦大学保健科，一手创建了化验室。在两年的流感疫情中，邢醒承担了数千人次的化验任务：“很多人发热，38、39 度。我负责化验，如果白血球高，一般是炎症引起的发烧，如果白血球低，那基本是病毒性的（流行性感冒）。”

照片中的 9 位医护重点服务登辉堂隔离病房。邢醒回忆：“当时人太多了，有传染性。佩琳院（注：保健科所在地）没有病房，就在大礼堂隔离，设置了床铺，食堂负责

送饭。”55 级历史系阮国英详述了当年的情形：“隔离病室在二楼的大礼堂内。当时二楼大礼堂是平整的，不像八十年代改造后有坡度。学校将长条椅撤到一旁，里面安放几十张病床，一排一排，整整齐齐。”

阮国英总结说：“像现在武汉的方舱医院，只是当时我们说隔离室。”

奋战：一切服从防治流行性感冒

有了前一年的前车之鉴，学校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升级。1957 年 3 月 31 日校刊中提道，“学校领导除设立隔离病房、进行各种积极措施外，希望全体师生员工切勿麻痹大意，大力加强预防工作，注意环境与个人卫生……希望尽量少上或不上热闹公共场所”。到 4 月 13 日，校刊称“流行性感冒仍在我校蔓延。据统计，最近两星期来，进登辉堂隔离治疗的，已达八百人次；在保健科门诊处治疗的，也已达三千人次。”学校领导在探望关心的同时，

左图：
1956 年登辉堂医护小组合影。前排左起：王芝芳、唐怀芬、李伟民、吴荣山。后排左起：佚名、陆菊娣、沈翠梅、任健。
图片提供 / 王芝芳 复旦档案馆藏

右图：
1957 年登辉堂医护小组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唐怀芬、沈翠梅、邱瑾、王芝芳。后排左起：吴荣山、孙承烈、邢醒、王奉荣、杨银春。图片提供 / 邢醒

